



【中国日记之童大焕专栏】

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遗弃”

震惊全国的董文语系列杀人、强奸、抢劫案6月8日上午在浙江金华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判处董文语死刑。(《检察日报》2007年6月9日)

令人心惊胆寒的不仅仅是董文语作案时的残忍,而且还有其听到死刑判决时的一脸漠然。只有对自己的生命和价值毫不珍惜的人,才会对他人和社会表现出极端的冷酷与无情。

董文语1978年出生于浙江平阳一个农民家庭,只读过三年小学。父亲好赌,母亲经常吵架,后来离异,他11岁开始在全国到处流浪,其间先后因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入狱,捕前靠偷东西为生。对于亲人的感受,董文语自述:“对父母,开始是恨,因为他们把我抛弃了,后来也就没什么好说了。老家的人都很势利,有钱时哥哥就对我好些,没钱就取笑我。”问及犯罪的动机,他说:“因为我憎恨这个社会。”“除了奶奶,从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好像我不属于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入过问过我的感受。”“人绝望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杀,要么杀人,我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我选择了去杀人。”

他把自己的不幸当成了

犯罪的借口,却丝毫无法减轻自身的罪孽。然而当初他生命的萌芽,难道也是今天这样的罪孽深重么?当他还是个11岁的小小少年到处流浪的时候,有谁能预言他的今天,竟然会带给社会这样深重的伤害?他身上的罪恶和仇恨日积月累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这个社会“遗弃”得越来越彻底的时候。他先是被父母“遗弃”,然后是学校,然后是整个社会。仇富绝不是董文语的本意。在他过去29年的人生中,最缺乏的不是财富,不是成功,而是温暖和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饥饿并不单指食物,而是指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排斥。”修女圣洁的智慧与爱的光芒足以烛照千年,然而董文语仍然不幸成了这光芒照不到的一分子。

首先,爱应该来自家庭。亦如特蕾莎修女所说,爱应该在家庭中成长。然而今天的世界,每个人都极度忙碌,渴求更大的发展和追求更多的财富,以致父母、子女之间没有时间彼此关心,甚至自私冷漠,招致家庭生活瓦解,直接扰乱着这个和谐的世界。董文语就在这样的家庭崩溃中被抛弃。

这时候,学校应该成为诺

亚方舟,托住董文语幼小的生命。然而没有,他还没有完成的九年义务教育,就被过早地抛上了社会。

是啊,当家庭无力支撑的时候,后面应该还有学校。学校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应该是幼小心灵的坚定后方。不仅提供知识、必要的衣食,还应该有专门的心理教师,帮助孩子们从小面对不幸和挫折。再次,还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社会应该在家庭和学校遗忘的地方,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人。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一盘散沙,各种社会组织自身都发育得就像没有根的豆芽菜。而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超出社会的应对水平,各级政府专门针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托管机构依然付之阙如……

我们的社会不希望再出现下一个马加爵、董文语之类的极端仇恨社会的犯罪分子。但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一个人的被遗弃,就是所有人的被遗弃;一个人的噩梦,就是所有人的噩梦。董文语案,又是一个残酷的证明。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及时伸出手,随时,随地,把冰冷,暖化在手心。

(作者童大焕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媒体思想之胡志勇专栏】

有一种失实报道值得公权反思

近日有报道称,民航总局将于年内修订《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将放开对机票价格的管制,现行的机票最低“限价令”将被打破,航空公司的航线竞价将不再设下限。民航总局称,媒体这一报道失实。(6月11日《新民网》)又是一起公共政策报道失实的案例!扳起指头算,不,手指加脚趾不过二十个,得拿着计算器算,因为这几年随着公共新闻报道的兴起,公共领域尤其政策走向的失实报道频率增大,几乎每过若干天都会有某个公权机构站出来喊话:某某报道失实了!

为了节省读者宝贵时间,我列举若干比较耳熟能详的失实报道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5年内中国大学将再扩招438万人”失实;“陕西取消事业单位厅局级级别”报道被指失实。再往前追溯,银联曾辟谣,有关“银联酝酿100多项收费”是失实报道,“央行拟推出房贷五成按揭政策”、“铁道部酝酿在火车票中加收铁路建设费,火车票将要涨价”、“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上报的取消医疗广告计划”等报道,均被指内容失实。

无论是媒体从业人员,还是业内专家学者,对此每每痛心疾首地指出媒体和记

者的若干病症。我这里只想说从“失实报道”里发现的一个思路: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媒体而言,前者在很多政策的制定和释放过程中,对媒体有一种天然的“拒绝性”,很多时候很多政策信息都是被动地接受采访后公开,而非主动全面地告知;而后者往往有一种对公权的“恐惧症”,经常在重大政策信息采访方面碰壁,于是在找不到烧香的门拜佛的殿后,转而从外围入手,对边缘人士下手,以期通过“曲线采访”的途径将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释放出来,这往往容易使信息变形异化。

很多所谓的失实报道,暴露出了政策制定者在信息公开与披露机制方面的普遍问题。正是这种机制的不完善,正是政策制定者在平时没有养成一种和媒体随时交流沟通、随时答疑解惑的习惯,没有真正达到“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才具有唯一权威性”的民间印象,所以,很多“失实报道”就今天从某个部委的司长口里道听途说开来,明天从某个部委副局长的私下谈话传播开来,后天甚至从某个接近部委的消息灵通人士口中广而告之。

把前面列举的失实报道拿来剖析,几乎都存在一个通病:消息的披露没有采访

到政策制定部门的新闻发布人士。恐怕问题不是记者偷懒或不懂新闻采访规律,当一种问题成为一种现象时,里面一定存在某种机制性的原因。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而言,对重大政策的采访事关公共利益。如果公权部门的权威信息发布机构就像公路上跑的“招手停”一样好找;如果政策制定部门的门,就像超市商场一样好进;如果采访权威人士就像采访普通老百姓一样好说话;如果公权机构官员都养成“在其位说其话”的职业素养,那么有几个记者愿意拐弯抹角地搞什么“曲线采访”,有几家媒体敢拿“道听途说”的消息去挑战新闻的生命——真实呢?在诊治记者们喜欢道听途说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制度氛围,使记者们不想也没必要去四处打游击道听途说!

说起报道失实,板子一般打在媒体和记者身上,这本没有错;但对于很多事关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新闻报道失实,只打媒体和记者显然偏颇。这类失实报道何尝不是给公权机构上了一堂课——如何让媒体的“失实报道”消亡于政府及时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上?

(作者系《华商报》编辑)

黑窑悲剧的基层“软政权化”阴影

■今日视点

在“黑砖窑”被曝光之前,“矿难频发”一直是山西洗刷不尽的耻辱,也是很多人“山西印象”中的关键词。而现在,黑砖窑中“现代奴隶”们惨绝人寰的遭遇,已经成为那片灰蒙蒙土地上更大的丑闻。

面对令人发指的现代奴隶工场,所有的追问在指向那些人性泯灭的黑窑主时,亦同时指向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据报道,涉案地之一的山西洪洞县已经开始“严查失职渎职”。这当然极其必要,但即便那些孩子全被解救,那些黑窑主和打手全部服法,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全部惩处,也远不表示事情已结束。从矿难频发到现代“奴隶工场”的长期肆虐,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凸显:当地基层

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软政权化”特征。

“软政权化”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各级公务人员缺乏对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在“软政权”中,通行权钱交易原则,制度、法律、规范都可以讨价还价,由官员随意决定是否执行。一些权力执掌者利用这种“随意性”大肆牟取私利。看媒体披露的众多家长在山西解救孩子的过程,不难知道,当地政府的许多基层工作人员便正是如此,不仅不积极营救那些被奴役的童工,甚至还暗自保护着黑窑主的利益。

早从数年之前,有关山西黑砖窑的报道便惊爆于媒体,比如2003年《华商报》便曾作过“17岁少年张徐波被拐骗至山西永济砖窑做工遭非人虐待”的系列报道。此后几年来,相

关报道也是不绝于耳。早在好几个月之前,河南的家长便开始组织起来去山西寻子,并一直不断地向山西有关方面求助。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当地政府方面对黑砖窑毫不知情吗?显然不会。黑窑主之所以能够坐大,被奴役的童工竟然能够累积至上千人,当地有关权力部门和人员的失职渎职当然是重要原因。

因此可以说,当地基层政权之“软”,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当然,所谓的“软”也是相对的,因为与“软政权化”如影随形,往往是“西西里化”——即政府工作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合谋。通过黑砖窑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可以看出,当地已经隐约有了“西西里化”的影子。比如,当地派出所为什么要为寻亲的家长故意设置障碍?劳动监察部

门为什么竟会涉嫌倒卖童工?尤其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什么会对这些规模很大的现代奴役工场听之任之?与矿难频发的原因一样,若说其中没有“官黑合谋”,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一则评论讲得辛酸:“事实上对于那些农民工来说,洪洞县地方政府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如果往坏处想,或许不是“不曾存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本身间接造就了这样的人间惨剧。

基层“软政权化”也好,“西西里化”也罢,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类似矿难、现代“奴隶”这样的时代之耻就必将还会有所发生。所以,在解救被奴役童工的当务之急完成之后,思考如何解决一些基层政府的“软政权化”,已经是迫在眉睫。

(郭之纯)

韩国政府盖楼的“拖拉”值得学习

■公民发言

从1997年首尔市政府设立新办公楼建设基金开始,10年来反对修建新办公楼的声音就不绝于耳。面对压力,首尔市政府不得不多次修改建设方案,但仍然没有得到韩国政府的最终批准。

(6月15日《法制日报》)相信不少中国官员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发笑——建政府办公楼,怎么会10年还没建成?首尔市建设新办公楼拖了10年,当然不是因为没钱。那是什使韩国首尔市建设新办公楼拖了10年?原来反对意见太大,不仅有人要求政府放弃盖楼建公园,还有专家根据文物保护法指出,首尔市政府办公大楼建设必须考虑景福宫和德寿宫等文物古迹。面对不同意见,首尔市政府不得不多次

修改建设方案,降低层数、缩减建筑面积,但还是没能完全消除人们的反对声,所以直到现在新办公楼还没有建设。

这要是我们中国,恐怕即使在穷乡僻壤也早已建起来了。不是吗?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在建设机关大楼上,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今天决策,明天就能建设,即使资金还没有到位,即使老百姓普遍反对,也能在很快的时间内建起一座漂亮华丽的政府大楼。何以如此?说到底还是没有严格的监督。作为韩国首都的首尔新办公楼建设之所以拖了10年,就是因为首尔市政府的一言一行受到了很大监督,政府的言行受到很大制约,从而才有了这种“拖拉”。这种“拖拉”以及迫使政府“拖拉”的机制,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肖华)

违纪官员“坦白从宽”不能逾越法律

■热点纵论

距中纪委“反腐大限”还剩14天,目前河南省已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人均8386元)。

(6月15日《大河报》)所谓“反腐大限”,是按照中央纪委印发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要求,如果存在违纪问题的党员干部30日内向党组织说明情况,可以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将被严惩。河南近千官员的主动说明问题和上交违纪款项,凸显这一反腐规定的威慑作用。不过,面对这些官员的“坦白账”,还让人感受到中

国反腐倡廉的长路漫漫。

以河南官员的“坦白账”为标本,坦白固然要从宽,但谁也无法保证这些“坦白者”里面没有贪腐大鳄,妄图借助“坦白”的侥幸心理避开反腐利剑。这是这这笔“坦白账”所昭示的反腐困境之一;更重要的是,更有那一班隐藏极深的巨贪们,又哪会被“反腐大限”威慑,这是反腐倡廉遭遇的第二大难题。

法制反腐、道德预警、制度强化、党纪约束,中国已经形成了立体多维的反腐立体体系。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这一反腐体系的各要素往往脱节,造成了反腐网络的漏洞盲区。譬如这一“反腐大限”,应该说是党纪约束的

一种形式,其开出的坦白从宽条件是有尺度的,绝对不可以给违纪官员们造成“交了钱就万事大吉”的假象。从河南官员的“坦白账”看,每个官员平均违纪金额达到8386元,按理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如何处理好宽大和法律严肃性的矛盾,是有关部门亟须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从宽从轻处理的尺度不可泛化到僭越法制的程度底线,否则违纪官员们会存侥幸心理,暗藏的腐败大鳄也会暗自讪笑,公众更会误解其为一阵风的反腐运动。

所以,“反腐大限”只是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契机和线

索,“坦白者”的出现更给了法律顺藤摸瓜的机遇,党纪法治的双重惩罚显然要比单方的从宽要理性和公正得多。由于“反腐大限”的威慑作用,党纪和法制都有可能面对“坦白者”众的难题,破除中国传统习惯中的“法不责众”情结,是党纪和法制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充满道德情愫的中国俗语或许对个体的人有效,但是对于掌握公权,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公仆们而言,一旦失足,道德上的自省并不能免除其党纪和法律上的责任。

(张敬伟)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让每个失业者都能感受“国家关怀”

■公民发言

劳动保障部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存在。

(《新民网》6月14日)这意味着“失业大军”将长期存在,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唯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失业保险金的普惠到基层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充分供给,都需要得到加强,保障一个失业者不致陷入“饿无所吃、病无所医”的困境。近年来,国家已经或即将对失业大学生以及城市失业人口纳入社保体系,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失业现象,还需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除了给失业者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完善保障体系外,国家也应从以往的“藏富于国”政策,转型为“藏富于

民”,让民众分享更多改革果实。如此,当一个家庭中出现一两个失业者,其他家庭成员有比较充分的收入,保证整个家庭生活不会严重下滑。而人口福利政策的优化,比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施行、住房市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扩大供应,都会减少民生负担,给低收入乃至失业者提供生存底线保障。

“从摇篮到坟墓”是人们对欧洲完善社保体系的描述,也代表了一个相对均衡发展的社会,能够提供给民众的集体安全感和国家保护。如果说“失业大军”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那么,政府理应给予最充分的全盘设计,让失业者内心深处坚信:他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教育再深造、接受培训)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也能够得到来自政府的制度性安全保障。

(毕舸)